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本书的主题与研究意义

一、本书的主题

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可以 1979 年为界线，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以来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前一时期，人们曾经迷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后一时期，人们也曾笃信“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可以自由地、充分地调节国民经济，使之均衡、协调、和谐地发展。然而，历史已经表明，这两种理想状态都没有真正实现过。现实是，总量增长周期波动，结构演变频发失衡。如果说，加工产业还时而短缺、时而过剩的话，那么，基础产业则几乎一直处于“瓶颈”状态，虽然间或“瓶颈”状态也有所缓解。原因何在呢？长期以来，乃至今日，流行的分析是资金短缺。可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是以高积累（积累率长期高达 30% 以上）为特征的，改革以来国内

总储蓄率长期保持在 30%以上(1981 年为 27%除外)^①,可见,中国基础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社会总量资金不足,而是如何动员和筹集国内可利用资金,保证将足够高的储蓄率用于基础产业——这是当代中国经济“最困难”和“最紧迫”的问题。本书正是知难而进,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为己任。

经济科学博大精深,它是致用之学,是“经世济民”的学说。无论本书最终对经济科学贡献了什么,贡献了多少,但它的出发点是毋庸置疑的,它恪守经济科学的宗旨,尽其所能,潜心求索。本书试图抓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表现最明显、矛盾最突出、解决最困难的基础产业瓶颈问题,在改革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和资金来源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探寻新的资金融通渠道和方式,以期消除瓶颈,促进基础产业发展,进而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这一研究主题表明,本书并不是一部“纯学术性”的著作,而是力求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二、主题研究的由来

本书以基础产业资金筹集为研究对象,就其学科归属而言,应属于产业经济政策的序列。它以产业经济理论为指针,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及其金融创新工具,选择可行的基础产业资金筹集和发展

由于中国现行统计的 GDP 存在着对服务业增加值的低估问题,因而这个国内总储蓄率略有高估,再考虑剔除折旧后的净储蓄率可能不超过 30%,但不可否认,这样一个总储蓄率仍然是相当高的。

对于中国基础产业融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阿列克·凯恩克劳斯认为是“最困难的”,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认为是“最紧迫的”。参见罗精奋、郭树清主编:《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258、269 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

方式。从理论逻辑来看，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若干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如：基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在产业结构的长期演变中充当什么角色？中国基础产业发展长期受阻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基础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和在何种程度上干预基础产业的发展？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如何让市场机制在基础产业领域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路？等等。如上这些问题作为本书的前期研究工程在作者的上一部著作——《基础产业发展论》中已经初步解决。如此而论，本书展开对基础产业融资的经济分析，是基础产业发展问题研究的继续和深化，是其理论逻辑和现实要求的必然结果。依本人管窥蠡测，也是孜孜以求一个理论上的完满结局。

应该说，理论研究并形成“作品”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取得对社会的外部经济效益，对于经济科学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本书选择基础产业融资这一当代中国经济的重大研究主题，正是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完成的。

三、主题研究的意义

研究基础产业融资问题，对于丰富和发展产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力图调节产业部门的均衡和发展。它包

参见王辰：《基础产业发展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从广义上说，产业政策不仅有产业结构政策，还有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等，这里从狭义上分析，主要指产业结构政策。

括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要保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防止和纠正各产业部门的失衡状态，以免影响经济的发展；二是“发展是硬道理”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更好、更快地促进经济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需要确立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作出产业发展重点的优先顺序选择。因为均衡是动态的均衡，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倾斜政策。

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的选择，是依据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成长的一般规律、本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阶段等条件作出的。由于经济技术关系的不同，各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有很大大差别的。总体而言，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有三类：

（1）瓶颈产业，即由于它们的供给能力不足，导致其他产业部门资源的闲置浪费，或资源配置成本过高和低效率；

（2）主导产业，即那些产品收入弹性大、生产率上升快和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

（3）支柱产业，即在国民经济中产值占比高的产业部门。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关系可简单地用“盛阳产业”和“朝阳产业”来比喻。

这三大产业部门一般都需要作适当的扶持，尤其是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在我国，瓶颈产业主要表现为基础产业，而基础产业，特别是电力、交通、邮电及城市基础设施等是不可能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缺口的，因此应当作为首选的重点发展产业。

参见王辰：《论基础产业与主导产业的双重非均衡发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4（5）。

如此看来，日本在战后首先采取重点生产的方式，复兴电力、钢铁、煤炭、化肥、交通等基础产业，并实施产业金融政策，绝不是偶然的。日本政府的经济官僚和官厅经济学家认为，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单靠企业管理的改善不可能实现经济快速振兴的目标，而必须规划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确定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并通过政府经济计划、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支持“战略产业”的起飞，诱导经济按既定目标跳跃发展。毫无疑问，这一产业政策比传统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干预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干预了产业部门间和产业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过程，它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传统教条的束缚；冲破了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的羁绊；同时，比凯恩斯主义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间接地干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政策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①。为基础产业融通资金，正是遵循产业结构理论、体现政府干预经济的上述思路，是重点发展产业和优先选择顺序的深化，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础产业融资的现实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指出，90年代及以后的中国经济，将面临四个基本的国内问题和三个主要的国际任务。

四个基本的国内问题是：

(1) 加强基础产业的供给能力，同时研究中央政府筹集资金的渠道和方法；

参见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2) 通过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来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

(3) 在明确财政和金融机构的职能划分过程中，设法由实物分配计划管理体制平滑过渡到资金分配计划管理体制；

(4) 强化资源转移机制，以利区域经济的调整。

三个主要的国际任务是：

(1) 紧密地参与东亚经济圈的分工；

(2) 设法缓解与美国之间的磨擦；

(3) 通过重建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公开经济统计，来引入与国际贸易实践相适应的贸易准则。

小林实认为，将上述问题和任务按其重要程序排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实际经济活动的发展比人们预想的要快。但是，他认为加强基础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最紧迫的^①。小林实对中国国际任务的分析或许具有某种局限性，但是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估计是十分中肯的。回顾近 50 年经济建设的艰辛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发展颠颠簸簸、冷热交替，除了体制不良和人为决策失误等原因外，从深层结构上分析，就是因为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使经济发展“足将行而趑趄”，快速增长屡屡浅尝辄止。可以预见，如果基础产业融资和瓶颈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终不能摆脱“大上快下、放乱收死”的不良循环。

基础产业瓶颈约束，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制约束”，基础产业瓶颈之所以形成并长期维持下去，必定有体制上的深刻原因。

参见罗精奋、郭树清主编：《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268～269 页。

参见王辰：《基础产业瓶颈：体制与非体制成因的系统考察》，载《管理世界》，1995（3）。

但无论深层原因如何，其直接原因都集中于资金的不足。因此，探寻基础产业发展的融资政策，并使之建立在制度规范的基础上，具有标本兼治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前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前人研究的历史演变

基础产业融资，本质上是一个资源合理配置问题，是在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利用产业金融政策干预基础产业发展的一种方式。现在各国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产业政策干预经济发展，主流经济学也都认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这种干预方式。然而，这一结果经历了经济理论上不断求索的演变过程。

古典经济学家十分推崇甚至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是唯一能够完善、合理地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的机制，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这其中最著名的，首推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论述。他说，每个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

本书后面的融资分析表明，基础产业融资方式及其制度的发展，还可以反过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金融创新，丰富居民投资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品种。但这不是本书主题研究的直接目的，故不作详细阐述。

益。^①但斯密的论述，只是一个“天才的猜想”，而没有严密的证明，他没有具体说明“看不见的手”是怎样实现稀缺资源在各种需要之间有效分配的。

这一任务是由 19 世纪 70 年代特别是 19 世纪末以后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完成的。以马歇尔 (A. Marshall)、瓦尔拉 (L. Walras)、帕累托 (V. Pareto)、米塞斯 (Mises)、哈耶克 (Hayek)、克拉克 (J. B. Clark) 等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精确的分析。他们的分析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市场供求形成的均衡价格，能够引导社会资源作有效率的配置，使任何两种产品对于任何两个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任何两种生产要素对于任何两种产品生产的“技术替代率”都相等和任何两种产品对任何一个生产者的“边际转换率”同“边际替代率”都相等，从而达到任何资源的再配置都已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同时，使一些人的处境变好的所谓“帕累托最优” (Pareto optimum) 状态。

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动摇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1936 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出版，则更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大有崩溃瓦解之势。凯恩斯的这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本世纪内对社会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并把凯恩斯《通论》产生的影响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2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参见加尔布雷斯：《凯恩斯主义为何来到美国》，转引自 [美] 萨缪尔森：《经济学文选》，7 版，91 页，1973。

尔文在生物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是强调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实现单凭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所无法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极力主张运用财政政策，从有效需求角度干预经济发展。但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亦有其局限性，他只研究了国民收入的运动，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部门之间的生产与交换关系抽象掉了。在凯恩斯主义那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仅限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调节，仅限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仍不能摆脱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威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就业问题。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涉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关系，这也就是部门之间的关系了。产业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出现，就是对占主流地位的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因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分析，不仅要求回答国民收入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而且要求实实在在地回答再生产过程中产业之间的复杂的运行流程，从而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全貌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还要求努力探讨实现产业部门之间在发展中的均衡和对产业发展的外部效果的控制等问题。因而，产业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它以经济发展动态的眼光，寻求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合理配置。由此，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就把以往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从需求角度，而且从供给角度，不仅从总供求关系角度，而且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角度，实施更具体、更深刻的干预政策，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所未能涉及的^①。

参见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6页。

前面分析由政府干预产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两种类型的产业，即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由于基础产业具有下列特征：（1）它是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赖以进行的基础性条件；（2）其产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3）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4）容易导致自然垄断；（5）基础产业中的基础设施一般不可能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缺口。因此，基础产业往往更是国家产业政策予以重点扶持的产业部门。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把基础产业作为产业政策扶持的重点，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几乎都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且鼓励民间资金对基础产业投资。我国政府也一直强调把基础产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心，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重申“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使之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由基础产业的经济技术和成本收益的特征所决定，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资金融通体制和方式。这就是基础产业融资理论演变的前提和由来。

近几年来，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国际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取得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成果。影响比较大的首推“基础产业长期建设资金筹集”课题组的研究，其主要贡献表现在：（1）研究了国民总储蓄与总投资的总量平衡及结构状况；（2）分析了基础产业部门资金筹集的困难所在；（3）观察了基础产业部门筹资环境和筹资方式的最新发展；（4）提出了改善基础

该课题成果见罗精奋、郭树清主编的《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

产业部门资金筹集的基本条件；(5) 初步构想了建立新型的基础产业部门的筹资体系。特别是该课题组还对基础产业中具体部门的资金筹集作了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1994 年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也对基础产业问题展开较为详实的研究。这份报告的副标题是“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它考察了基础设施与发展的联系，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及其质量方式，并认为基础设施是政府政策和政府融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领域，并得出结论说，投资数量不应成为政策的唯一中心，改善基础设施的质量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在于改善基础设施的营运机制，进行基础设施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该报告所提出的主要改革思路是，以往由政府部门或垄断性国有企业提供的绝大部分基础设施服务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不能满足用户需要，必须实行商业化原则、引入竞争机制等种种改革。

本书作者自 90 年代以来，亦比较关注和潜心地研究了基础产业的发展 and 融资问题，并取得了为理论界所瞩目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了下列基本观点：(1) 长期形成的基础产业“瓶颈制约”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制约”，体制改革滞后是改革以来基础产业发展不足的深层原因；(2) 要首先让市场机制在基础产业中发挥资源

例如，邵宁同志对水利建设的投资情况及其资金筹集的研究颇具力度，参见《基础产业建设资金筹集》一书第 198~202 页。

世界银行：《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参见王辰：《基础产业瓶颈：体制与非体制成因的系统考察》，载《管理世界》，1995 (3)。

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基础产业的价格体制、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3) 要让政府机制在基础产业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要实现政府职能和经济工作重心的根本性转换；(4) 要对基础产业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即“反赫希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③；(5) 要建立有利于基础产业筹资的资本市场；(6) 政策性金融必须遵循和执行国家制定的切合国情的产业政策，必须有特定的融资渠道，必须割断与基础货币的联系，不得向中央银行直接融资^⑤；等等。

二、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肯定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研究取得一些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研究还是初步的，还存在不少误区和薄弱环节。主要问题是：(1) 基础产业融资理论的研究滞后于实践，一些融资政策的分析还缺乏理论的支持；(2) 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多数散见于一些文章或研究报告之中，至今尚未有一部专门、系统、全面地分析基础产业融资的专著；(3) 多数分析还局限于一些对策性研究，存在经验主义倾向，还没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给予理论上有力的解释和创新；(4) 在基础产业融资问题上，还存在若干理论误区，这有可能导致政策上的偏差。

^② 胡乃武、王辰：《论我国基础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出路》，载《经济学家》，1994（1）。

王辰：《论基础产业与主导产业的双重非均衡发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4（5）。

王辰：《基础产业发展论》。

^⑤ 王辰：《关于借鉴国外政策性银行运作体系的几个问题》，载《上海金融》，1996（11）；《必须准确地把握政策性银行的特性》，载《金融时报》，1996-08-18。

理论研究上的误区主要有，对解决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的思路存在两种极端倾向，有人主张所谓的“重建财政”思路，留恋或期望重新启用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产业发展资金的解决方式；还有人寄希望于完全市场化，以为市场化、商业化运营机制可以完全运用于基础产业的生产和运营。这两种思路都有失偏颇。对前者而言，随着经济由财政主导型向金融主导型过渡，财政“大一统”的格局已经一去不复返，重建财政的思路是不现实的，政策上试图这么做也未见成效。对后者而言，基础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是一种社会性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性质，即使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经营。还有人把基础产业瓶颈现象的原因不是归之于发展不足，而是归之于对其需求过度。基础产业的供给不足固然是相对于其需求而言的，但瓶颈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不足，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它不能满足社会正常的、合理的需求。还有人根据经济周期一时的变化，如短期萧条、加工产业开工不足，从而对基础产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相对地、暂时地减缓等现象，得出所谓基础产业瓶颈已经消除、甚至过剩的判断。其实，一旦经济环境宽松，加工企业恢复和加快发展，基础产业瓶颈问题很快就会重现，经济生活中“经济增长加快——瓶颈约束加剧”的现象正是有力的证明。

再比如，世界银行 1994 年世界发展报告对基础设施的分析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份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是丰富的，一些分析颇有力度。但是，它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有明显的古典经济学倾向。殊不知，作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某些基础设施是无法完全由市场来提供的，或者由市场来提供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其次，这份

报告还流于庸俗历史学的时弊，用发达国家过去的经历来看待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完全否认国情的现实差别。此外，这份报告过分强调了基础设施经营机制上的问题，没有充分估计基础设施资金筹集过程的困难。

当然，由于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并且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体制条件的变化，解决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的方法也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因而在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研究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是不足为怪的。面对现实中的困难，经济学工作者的出路是唯一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①

第三节 本书的理论贡献与结构安排

一、研究的难点及理论贡献

坦率地说，基础产业融资问题是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重大研究课题。由于我国对基础产业融资的实践过程还相当短暂，尤其是理论研究涉足不深，难觅其“雪泥鸿爪”。更不用说系统性研究的著作，即使是研究性论文，也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研究，尽管难以至善至美，但亦具有开拓性意义。

在漫长而艰辛的研究历程中，本书在分析和克服下列难点的同时力求有所创新：

（一）基础产业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庞杂”的概念，在理论上又有很多误解。基础产业到底包括哪些行业、哪些部门，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分混乱。基础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要和迫切，但并不是重要的和需要迫切发展的行业就是基础产业。然而不少人就是有意（为了“论证”某些项目的重要性）无意（概念不清）地把所认为重要的、迫切的行业或项目说成是基础产业（项目）。如果说这一问题尚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合理地界定基础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话，那么要根据这一“界定”去搜集现成的统计资料就相当困难了。在本书的研究中，迫不得已通过“估算”的办法力求逼近现实。本书对基础产业概念作了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以期通过探讨和争论，取得对若干基本概念的认同。

（二）基础产业所涵盖的具体行业很多，其经济技术特征复杂，有的属于“公共物品”，有的因具有某些“公共物品”性质，可以看成是“准公共物品”，还有些则属于“私人物品”。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经济技术上的障碍，要作出上述判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特别是由于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和经营管理体制的缺陷，往往容易使我们的判断、分析误入歧途，由此还会引发政策上的较大失误。本书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物品”理论和产权理论，对基础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去伪存真”的甄别，并进而给出切合实际的规制政策。

（三）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时期，基础产业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部门。由于体制问题本身“积重难返”，也由于改革步骤是“先易后难”，因而基础产业的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明显地滞后了。对“体制滞后”了的部门的体制改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很难说就一定难改，但是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面对变化的外部环境，就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就会滋生许多“磨擦”和“冲突”。在基

础产业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其价格形成机制和资金回流状况都会有重大变化，其他产业对它的需求也会重新调整，其盈利性与非盈利性区分也只有在体制基本定型之后才能充分显现。只有在这一系列变革基本完成之后，基础产业的融资机制和发展方式才能最终稳定下来，并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本书把基础产业的融资置于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勾勒出了预见性的分析图景。

（四）基础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人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基础产业发展不足，对其他部门的发展就会产生“掣肘”效应，因而基础产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超前发展。但是，基础产业本身的发展又要以其他部门提供“设备”和原料、提供积累资金为条件；基础产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如果过于超前，又会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浪费。所以，基础产业如何发展，如何促进其资本的形成，是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书在研究中，针对我国基础产业发展不足的现实，依据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从长期协调发展的目标着眼，提出了“非均衡的资本形成战略”。

（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财政主导型经济向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转变，财政在基础产业的发展 and 融资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由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基础产业又客观上不能完全从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市场上融通资金。所以，基础产业的融资显得“青黄不接”，加之基础产业“补课”性的发展任务艰巨，资金需求十分巨大，单一的融资渠道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因而需要多种来源并存，多种手段并用。本书从财政、政策性金融、资本市场、利用外资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试图探讨从根本上解决基础产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依照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特性和难度，本人委实力不从心。本书对基础产业融资所作的解释和所提出的思路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未来经济发展和进一步研究的检验。同时，由于本书的研究是在我的前辈和同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本书的研究取得某些进展或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也不能完全归于我个人的努力。

二、本书的结构安排

全书由九章组成。

第一章：导言。

本章说明全书的写作宗旨、研究对象、主题思想、研究价值及研究方法；总结前人对基础产业融资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演变过程，指出本课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和若干理论误区；披露本书研究中遇到的主要障碍和难点，介绍在克服这些障碍过程中本书所取得的理论收获和进展，同时，对本书的结构安排和主要观点作简要的提示。

第二章：基础产业融资的理论基础。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的融资来源、融资方式的确定，是同其产业经济运行特征、产业的功能和作用密切相关的。基础产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其性质和特征把握的基础上。本章旨在阐明基础产业概念、分类、特征和在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为以后各章展开对基础产业融资分析和政策构想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本章是全书理论观点与结构体系的基础。

第三章：基础产业的资本形成战略。

本章从宏观角度分析基础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战略选择。资本